

# 北欧三国防治校园欺凌的主要举措及经验借鉴

李建伟<sup>1,2</sup>, 刘思硕<sup>3,4</sup>

(1. 浙江工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2.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3. 杭州师范大学 经亨颐教育学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4. 青岛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山东 青岛 266012)

**[摘要]**当前校园欺凌事件频发,校园欺凌的治理成为世界性教育难题。北欧的瑞典、挪威和芬兰在治理校园欺凌方面起步早,体系健全,成效显著。三个国家通过出台法律,政府牵头,高校和科研机构参与研发反欺凌项目,依托丰富多样的反欺凌课程和活动,稳健地推进反欺凌行动,提升本国反校园欺凌的实效性。近些年我国高度重视校园欺凌防治工作,文章通过借鉴北欧三国反欺凌的成功经验,规避他们的失败教训,立足我国的国情,着眼于反校园欺凌体系的构建,遵循科学研究的范式,聚焦反欺凌项目的研发,将我国校园欺凌治理工作落到实处。

**[关键词]** 北欧三国; 校园欺凌; 体系构建; 干预; 评估

doi: 10. 3969/j. issn. 1673-9477. 2025. 03. 010

**[中图分类号]** D922. 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25)03-0080-0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是一门‘仁而爱人’的事业,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爱就没有教育。”<sup>[1]</sup>教育理应有爱的教育,校园理应是富有情感的校园,但是欺凌却一直作为世界性的教育问题而存在,其普遍性和不良影响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一项对全球48个国家134229名12—15岁青少年的调查显示,欺凌受害的总体流行率为30.4%。<sup>[2]</sup>受欺凌儿童更容易遭受长期的社会孤立、孤独感、焦虑和社交能力下降,并且出现自杀倾向、尝试和完成自杀的风险增加等问题,这些问题经常持续到成年。<sup>[3]</sup>尽管人们对欺凌的不良后果已经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但对反欺凌项目的成效了解依然很少。

健康青年发展蓝图(Blueprints for Healthy Youth Development)作为一个汇集减少反社会行为项目的网站,它的负责机构(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行为科学研究所)审查的1500多个项目中,只有不到5%被评为有前途的项目,其中包括3个反欺凌项目——Olweus计划、实现尊重的途径(Steps to Respect)和KiVa符合有前途的“蓝图标准”。其中,Olweus计划(以下简称OBPP)来自挪威,在该计划实施的6年间,奥斯陆市的14所学校被欺凌人数和欺凌人数分别下降40%和51%。<sup>[4]</sup>KiVa是芬兰全国性的反校园欺凌和暴力项目,2009—2024年的15年间,芬兰基础教育阶段(1—9年级)参与该项目学校的被欺凌事件从18%降低到低于12%。<sup>[5]</sup>此外,在一

项对28个国家的11、13、15岁青少年欺凌率的调查中,瑞典欺凌流行率的比例最低,男孩为6.3%,女孩为5.1%。<sup>[6]</sup>本文根据Web of Science提供的数据(2006—2024年),北欧的瑞典、芬兰和挪威关于校园欺凌的发文量在全球国家中排名靠前,分别排在第10、12、13位,且在干预校园欺凌方面取得很好的成效。近几年,我国治理校园欺凌的力度不断加强,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健全。本文通过对瑞典、挪威、芬兰三国在反欺凌上依托的项目和大量的实践进行归纳整理,从中提取可以借鉴的实践经验,旨在为我国推进校园欺凌治理提供有益的帮助。

## 一、北欧三国防治校园欺凌的发展历程、法律保障与行动目标

### (一) 北欧三国防治校园欺凌的发展历程

#### 1. 瑞典:反欺凌的去中心化

1990年之前,瑞典的教育体系高度集中,由国家教育管理委员会控制。1990年以后,在瑞典新成立的教育部的监督下,教育决策权逐渐从中央政府转移到地方市政当局。<sup>[7]</sup>瑞典有严格的立法来防止歧视和攻击行为,2010年以前,瑞典教育部通过提供现成的标准预防项目来支持这些立法,学校可以购买这些项目。2007—2011年间,瑞典教育部对瑞典学校中最常用的反欺凌项目进行了一个主要的评估。评估指出,使用项目作为完整的“套餐”存在诸多问

**[投稿日期]** 2024-12-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编号:22VZ099);山东省社科规划专项课题(编号:23CSZJ45)

**[作者简介]** 李建伟(1979—),男,山东临沂人,博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情感发展素养研究。

题,主要是因为大多数学校及其特定问题都有其独特性。常用的这些项目包含的大部分内容被证明有效果,但也包括无效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适得其反或有利的部分。<sup>[8]</sup>基于这种情况,2012年以来,瑞典的一些学校开始寻找新的反欺凌方式。一些瑞典的市政区启动了一个名为“市政反欺凌预防模式”的项目。<sup>[9]</sup>该项目鼓励学校利用自身资源解决自身问题,并提出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参与该项目的实践者均在不同学校担任校长、辅导员或教师。每所学校的一部分实践者组成安全团队,负责处理最严重的欺凌案件。一些实践者还成立专门的工作人员小组,受邀参加关于欺凌的专业讲座,并收到瑞典教育部提供的研究和新出版物的额外电子邮件信息,以便与同事分享。这种去中心化的变化,尊重市政、学校的干预自主权,学校通过自己的课程解决自己的欺凌问题。

### 2. 芬兰:高 PISA 得分与低学校喜欢度的矛盾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1、2004、2007和2010年的PISA评估中,芬兰15岁的儿童在阅读素养、数学素养、解决问题和科学素养方面名列前茅。与芬兰学生在PISA中的优异表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对学校的喜欢度比较低。2004年,世界卫生组织关于青年人健康的报告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与其他34个国家或地区相比,芬兰11岁和15岁的青少年很喜欢学校所占的比例最低,而13岁的青少年位列倒数第四。<sup>[10]</sup>这个报告引起芬兰政府的高度重视,欺凌问题也随之受到芬兰社会的广泛关注。2005年,芬兰教育部任命并组建学校福利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一项建议是考虑在芬兰实施一项国家反欺凌计划。<sup>[11]</sup>2006年,在芬兰教育部的资助下,图尔库大学启动了KiVa的研发。经过两年的试验之后,该项目于2009年在芬兰全国范围内推广,一直影响至今。2020年,KiVa项目的主要专家之一——芬兰的克里斯蒂娜·萨尔米瓦利教授获得了欧洲研究委员会(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250万欧元的资助,用于将她的研究应用到最持久的欺凌防治案例中,并为其创造新的干预模式。<sup>[12]</sup>

2023年,芬兰教育评估中心(FINEEC)在2021—2022年对包括KiVa在内的7种反欺凌项目进行评估。参与调查的88所芬兰KiVa学校,大部分使用该项目超过10年的时间,受调查的参与者中,55%的人认为该项目在防治欺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sup>[13]</sup>

### 3. 挪威:一波三折的欺凌干预行动

挪威的反欺凌行动由政府主导先后进行了四次。第一次挪威国家反欺凌行动始于1983年秋。

1982年,挪威媒体报道两个青少年因为被严重欺凌而自杀。紧接着挪威的教育部部长成立了一个小型的委员会,委员会为教师制作了一本有关欺凌预防和干预机制的小册子,还有视频和其他材料。<sup>[14]</sup>然而,1993年和1995年的后续研究发现,除了卑尔根市之外,其他地区的欺凌状况没有任何改善。<sup>[15]</sup>挪威第二次国家反欺凌行动(1996—1997年)历时两年。1996年,挪威新任教育部长决定重新开启对挪威学校中欺凌行为的关注,并要求行为研究中心(CBR)负责这项工作。但成效并不明显,CBR在1995、1998和2001年春季进行的全国性调查结果显示,受欺凌和欺凌学生的数量几乎线性增长了60%以上。<sup>[16]</sup>

基于这种现状,挪威总理于2002年秋季发起并签署了《反欺凌宣言I》。该行动历时两年(2002—2004年)。作为宣言的一部分,所有学校都应制订一份描述反欺凌运动的书面计划,这项工作在当地教育部门的监督下进行。挪威政府聘请罗加兰研究中心(Rogaland Research)来评估宣言的影响力。<sup>[17]</sup>2005年挪威选举产生了新政府,新政府签署了《反欺凌宣言II》,该行动从2006年持续到2009年。

2013年,挪威的教育部门针对全国欺凌问题调查中表现最差的学校和地区推出了由CBR专门研发的为期两年的“学习环境项目”。<sup>[18]</sup>2018年,第三方评估显示,该项目在降低欺凌发生率方面成效显著。另外,从2015年开始,挪威不断修订《教育法》,以确保对儿童的保护,新修订的《教育法》于2024年8月生效。<sup>[19]</sup>

## (二) 北欧三国防治校园欺凌的法律保障

北欧三国针对校园欺凌在法律保障方面的突出特点是责任主体明确。早在1993年瑞典修改《学校法》时,就规定教师有预防校园欺凌的义务。2006年,瑞典颁布了一项特别法律来禁止对儿童和学生的歧视和其他有辱人格的行为,如果学校不采取积极措施防止欺凌,学校就要承担责任。<sup>[20]</sup>2010年,瑞典全面修改《学校法》。该法律认为学校经营者防止和规制校园欺凌行为属于法定责任,尽管学校和教师不能采取法律上的强硬措施,但是有通报的义务。在欺凌的损害赔偿方面,瑞典的《学校法》遵循无过错原则,只要学校未能防止欺凌现象的发生,学校就应承担一定的责任。<sup>[21]</sup>如果教师、校长、学校经营者违反“报告以及实施调查”义务,致使欺凌行为给学生造成损害的,学校经营者应当给予损害赔偿。《学校法》规定,学校的校长在确认校园欺凌的行为后,

可以对学生提出书面警告、调换班级,甚至在上述措施效果不理想的情况下,可以要求欺凌者暂时转学或暂时停学。当然,转学和停学的实施都有条件要求,一是不能耽误学生的学业,必要时可以进行补课;二是停学不能经常使用,且一次停学的时间不能超过两周。<sup>[21]</sup>

2003年,挪威修订《教育法》时,追加“学生的学校环境”一章,提出为给学生创造良好的心理社会环境,学校应保护学生不受侮辱性言语及其他欺凌、歧视、暴力等行为的侵害。<sup>[19]</sup>除了《教育法》,挪威的《公平性别法》和《幼儿园法》中也都有禁止欺凌行为的相关规定,挪威新《学校法》的第9A段规定了学生享有良好和安全的学习环境的权利,规定学校对诸如欺凌、暴力、歧视和骚扰等违规行为实行零容忍。<sup>[22]</sup>修订《教育法》的目的是确保反欺凌监管更有效,反欺凌法规得到更好的执行。

1998年,《芬兰基础教育法案》规定,芬兰的学校不仅有责任制定相关的制度或者行动方案来反对骚扰、校园暴力和欺凌,而且也有责任执行和监督行动方案的实施。<sup>[23]</sup>1999年,《芬兰基础教育法》规定,每个学生都有权享有安全的学校环境。教育提供者有责任确保学生在学校时不会遭受暴力或欺凌行为。2003年,该法案进一步规定,教育提供者在设计方案时必须与课程的设计相结合,以更好地执行该计划,并监督其遵守情况及预防暴力、欺凌和骚扰的发生。

北欧三国明确的法律规定将校园欺凌的责任划分得非常清晰,避免欺凌事件发生时,各相关方互相推卸责任或者不作为,有效保护受欺凌学生的合法权益。

### (三) 北欧三国防治校园欺凌的行动目标

北欧三国实施反欺凌方案或者项目时,行动目标都比较清晰。

瑞典“校园欺凌预防项目”的目标包含四个方面:第一,提高教师对欺凌行为的认识水平;第二,构建家长与教师之间真诚、积极的合作关系;第三,制定明确的预防校园欺凌的规章制度;第四,加强对被欺凌者的保护。<sup>[21]</sup>瑞典预防欺凌项目主体是学校、教师和家长。

挪威的OBPP目的是改善同伴关系,创建一个温暖、积极的学校环境。<sup>[24]</sup>OBPP的主要目标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减少学生中已经发生的欺凌行为;二是预防新的欺凌问题的发生;三是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校环境和同学关系。挪威的另一个具有影响力

的反欺凌项目“零容忍方案”,目的是创设一个识别攻击性行为和防范欺凌的学校环境,并为学生量身定制成人干预和过滤下的安全区域。<sup>[25]</sup>“零容忍方案”注重培养教师对校园欺凌的认识水平,提高教师解决欺凌问题和预防欺凌发生的能力,学校、学生和家長共同创造一个无欺凌的校园环境。该项目的焦点在教师身上,主要是提高教师的认知水平和干预能力。

KiVa由克里斯蒂娜·萨尔米瓦尔利教授领衔的项目组研究并提出。经过十几年的研究,他们发现很难短期内让受欺凌者变得更强大或者让欺凌者直接改变他们的行为。研究认为,移情和防御的自我效能感有助于对受害同伴提供支持。<sup>[26]</sup>因此,芬兰的KiVa将欺凌事件中的旁观者作为干预的重点对象,发挥旁观者在欺凌事件中的干预作用。

清晰的行动目标为后续的反欺凌项目指明了方向,避免因活动过于分散、目标凌乱而影响整个项目或者方案的效果。

## 二、北欧三国防治校园欺凌的项目实施

### (一) 项目推进:多样化的项目供学校选择

瑞典的反欺凌项目来源较多,有的是本国机构开发,有的是借鉴其他国家的一些项目,常用的项目有20多个,其中8个项目比较有影响力。主要包括Farsta方法(预防和补救计划)、Friends(同伴支持模型)、Lions Quest(强化基本价值观)、OBPP(预防和补救行动)、社交和情感培训(简称SET,强化基础价值观和阻止有辱人格的行为)、学校彗星(强化基本价值观)、学校调解(使用调解和冲突解决)和第二步(强化基本价值观)。<sup>[27]</sup>这8个项目中,Farsta、Friends和学校调解项目由瑞典开发,OBPP来自挪威,另外四个是根据美国的做法改编而成。为了满足问责制的要求,瑞典的许多学校从公开市场上选择可用的反欺凌项目。

挪威有4个比较有影响力的反欺凌项目。其中的OBPP由挪威教育部委托卑尔根大学负责开发,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奥维斯教授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身兼行政和科研双重身份。挪威的零容忍方案则是由挪威斯塔万格大学的学者于2003年开发。奥斯陆大学下属机构儿童行动挪威中心也开发了预防项目,学校仲裁所项目则是由挪威学校仲裁所制度研究会研发。作为《反欺凌宣言I》的一部分,挪威政府建议并支持OBPP和零容忍方案。OBPP于2002年宣布宣言I时开始运行。零容忍方案则是2003年初,由挪威教育部发起,CBR实施。这两个

不同的项目都基于一个共同的根源——挪威第一次全国运动时制作的小册子。

芬兰的 KiVa 由芬兰教育和文化部赞助支持,由芬兰图尔库大学的克里斯蒂娜·萨尔米瓦尔利教授带领图尔库大学心理学系和学习研究中心的 12 名博士生导师共同研发完成。芬兰教育和文化部与图尔库大学之间的第一份合同(合同期限为 2006—2009 年)主要是有关 KiVa 项目的开发、在试点期间对教师进行培训和指导,并对项目效果进行初步评估。在开发 KiVa 的过程中,项目组得到了芬兰教育部和芬兰国家教育委员会(FNBE)的大力支持,该项目的领导小组中有一位 FNBE 的代表。<sup>[28]</sup>

## (二) 实施对象:涵盖范围和人员广泛

瑞典的《学校法》和欺凌预防项目适用于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所有学校。挪威的 OBPP 针对 5—18 岁的学生,旨在改善学校文化、制定规则、开展活动,并提高团队意识来减少欺凌行为的发生。芬兰的 KiVa 适合 7—16 岁的儿童和青少年。综合来看,三个国家以中小学幼儿园作为项目实施的主要对象。

瑞典、挪威和芬兰的欺凌预防计划的开展呈现相似的特点,都是以学校为纽带,通过全面、系统的学校战略,将各方利益相关者纳入计划中来参与课程和活动,见表 1。

表 1 北欧三国反欺凌项目涵盖范围

国家	个人	班级	学校	社区
瑞典	教师分别与欺凌者和被欺凌者进行谈话,必要时,邀请家长共同商讨解决对策。	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制定班级规则,不对他人实施欺凌,保护受欺凌的同学。	召开由校长、家长、教师、学生、心理专家等参加的全校会议,研讨学校的校园欺凌问题,制订长期的预防计划。	—
挪威	确保教职工看到欺凌时能够及时阻止;与涉事家长交流;对涉事学生制订个性化的干预计划。	发布并执行反欺凌规章制度;定期组织班会;组织家长会。	建立欺凌干预协调委员会;培训委员及教职工;组织教职工小组讨论;检查并修订学校的监督系统;吸引家长积极参与。	将社区成员吸纳到欺凌干预协调委员会中;同社区成员建立合作关系,获得他们对项目的支持;在社区中进行反欺凌宣传。
芬兰	干预小组成员与欺凌的实施者和被欺凌的学生进行个体和小组讨论。	学生参与班级课程,通过课堂讨论、小组合作、观看视频、角色扮演、参与模拟游戏提高同理心。	提供反欺凌课程;提供虚拟的学习环境;为家长、学生提供《反对校园欺凌的学习手册》;3名教职工与课程教师组成干预小组处理欺凌事件。	向家长宣传有关欺凌的知识;告诉家长孩子遭遇欺凌后的补救措施;家长教给孩子制止欺凌的技巧。

## (三) 实施步骤:有序展开,点面结合

如表 2 所示,北欧三国在反欺凌项目实施上采取相对严谨的态度,前期进行调查研究,中期进行项目落实,后期进行项目评估,以保证项目开展的有效性。KiVa 在 2006—2009 年的 3 年间,先后在芬兰 275 所学校进行两次有效性试验之后,才在全国大范围推开。

## (四) 项目评估:对项目实施效果定期监控

对欺凌项目进行评估是北欧三国反欺凌的重要环节。2007 年,瑞典政府委员会安排项目组对反欺凌项目进行评估。<sup>[32]</sup>目的是对用于减少或防止瑞典学校中欺凌行为的 21 个方案的质量进行评估。结果发现,除 OBPP 外,所有可用的项目评估都缺乏科学严谨性,并且学校工作人员对反欺凌计划的理论基础和效果了解不足。这说明,项目并非

越多越好,有效才是关键。2011 年,由瑞典政府倡议,瑞典教育部又实施反欺凌和虐待项目评估来了解项目的实施效果。包括是否通过活动帮助学生与他人建立关系、学生积极参与反欺凌活动的程度、教师培训或教育、校园监督、合作团队的介入等方面。

挪威行为研究中心(CBR)在 1995、1998、2001、2004 和 2008 年春季分别进行全国性的调查,来了解四次全国性的反欺凌行动的效果。2001—2003 年间,OBPP 项目在挪威 58 所中小学进行大规模项目评估。评估时间长达 3 年,先后进行 5 次调查来验证项目的可靠性。2007 年以后,挪威政府对全国性的中小校园欺凌进行定期监测。从每年公布的 7 年级、10 年级和 11 年级的学生欺凌情况的结果来看,挪威中小校园欺凌发生率呈下降趋势,从 2009 年的 7.3% 下降到 2018 年的 4.6%。<sup>[33]</sup>

表2 四个项目实施步骤

项目名称	实施步骤
OBP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项目实施前,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学校欺凌现状;</li> <li>2. 指派项目培训师对教师进行培训并提供未来10个月内的咨询服务;</li> <li>3. 从学校、班级、个人、社区层面进行干预;</li> <li>4. 问卷调查,了解干预成效。<sup>[29]</sup></li> </ol>
零容忍项目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师生共同参与,防止欺凌的发生;</li> <li>2. 对发现或者举报的欺凌行为展开调查;</li> <li>3. 多方会谈,商讨解决办法;</li> <li>4. 发动学生持续、有组织地预防欺凌。<sup>[30]</sup></li> </ol>
儿童行动挪威中心的预防项目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面向全体学生,教师讨论制订总体的预防措施;</li> <li>2. 确定5%—10%的学生实施辅助性介入,对于受欺凌学生采取相关辅导措施;</li> <li>3. 选择1%—8%的学生集中进行社会关系训练和情绪控制训练,并进行个别化辅导。<sup>[30]</sup></li> </ol>
KiVa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筛查案例,确定欺凌事件;</li> <li>2. 调查讨论,与欺凌者和被欺凌者交流,了解欺凌的相关细节;</li> <li>3. 调停协商,干预小组与欺凌者们通过教育、调停等方式,帮助他们认识错误,达成共识;</li> <li>4. 干预辅导,对被欺凌者进行持续的心理辅导,并请班级同学提供情感和行为支持;</li> <li>5. 监督落实,干预小组与被欺凌者交流,确保欺凌事件不再发生。<sup>[31]</sup></li> </ol>

芬兰对 KiVa 的有效性评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2007—2008年)先对78所学校的8000多名4—6年级学生进行评估,评估显示该项目对自我报告和同伴报告的欺凌和受欺凌行为都有积极且相对较大的影响。<sup>[34]</sup>在第二阶段(2008—2009年),该计划在1—9年级进行了测试,总共有234所芬兰学校,约有35000名学生参与了这项评估研究。<sup>[31]</sup>此外,在开发 KiVa 的背景下,项目组创建了一个基于 Web 的工具,以收集评估期后实施 KiVa 的学校中欺凌问题流行率的代表性数据。2023年,芬兰政府又对7个反欺凌项目进行综合评估以确定哪些项目更为有效。

### 三、北欧三国防治校园欺凌的特点

纵观北欧三国20年防治校园欺凌的过程,呈现出一些比较鲜明的特点。

#### (一) 注重法律制度构建,学校反欺凌有法可依

北欧三国的校园欺凌防治历程,也是相关法律不断完善的历程,从欺凌认定标准、认定程序到明确学校和教师的主体责任,以及校园欺凌的民事救济途径,随着时代的发展愈发明晰。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法律作为教师防治欺凌的保障。通过法律明确学校、教师在防治校园欺凌中的责任和义务,如《瑞典教育法》规定,学校工作人员依法有义务向校长报告任何有侮辱性待遇的情况,校长则需向上级教育部门报告。<sup>[35]</sup>二是以法律作为学校积极参与防治欺凌的依据。北欧三国的法律明确学校对防治校园欺凌负有首要责任,学校有义务也必须采取

有力措施减少欺凌。如瑞典《反歧视法》规定如果学校监察局认为这些措施未得到充分执行,学校可能被迫向遭受骚扰或侮辱性待遇的学生支付赔偿金。<sup>[36]</sup>

#### (二) 加强政研密切合作,政府资助与专家领衔

纵观北欧三国影响力大的几个干预项目,都有着鲜明的特点,即政府牵头和扶持,科研机构或者大学作为研发主体积极参与。瑞典的20多个反欺凌项目采用国内研发和借鉴国外做法相结合的方式。挪威的四个反欺凌项目以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主。芬兰的 KiVa 是在政府主导下对项目的集中研发,政府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总体来看,科研机构(包括公办和民办)和大学发挥主体作用。挪威第一次国家反欺凌行动成效有限的原因在于,卑尔根市得到专家团队的支持,其他地区则没有,最后效果差异非常明显。因此,项目组的支持和专家的参与非常重要。一是丹·奥维斯和克里斯蒂娜·萨尔米瓦尔利教授等专家在接受政府委派的项目之前,在欺凌领域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为项目实施奠定了比较好的学术基础;二是项目的研发采取循证实践的模式。那些成效明显的项目在推进的过程中不是仅凭经验,而是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实验,在遵循科学研究的基本流程,基于证据的基础上不断优化项目,提升项目干预的成效。

#### (三) 彰显教师主体地位,欺凌干预才能走深走实

北欧的挪威在走了一段弯路之后,才醒悟到提升教师的干预效能感才是防治欺凌走向深入的关键

步骤。1996年,挪威吸取第一次全国反欺凌运动的教训,在全国范围内对350名专业人员进行了网格化培训来帮助学校进行反欺凌活动,这些专业人员包括教师、班主任、校长和学校心理教师,几年后这批专业人员成为实施挪威反欺凌宣言的重要人力资源。<sup>[15]</sup>OBPP项目组对要实施该项目的学校教师进行一年半的项目培训,以提高教师的反欺凌水平。本文在介绍4个有代表性的欺凌项目实施步骤的过程中,能够看到教师在各个干预环节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欺凌干预一定要下沉到教师层面,不能在区域层面出台制度,学校层面喊喊口号、签签协议书就算完成,必须要夯实学校,尤其是教师反校园欺凌的主体地位。以学校作为反欺凌主体有着诸多优势,一是学校、教师与学生接触最多,对学生施加的影响也最直接、最有效,任何项目都不可能越过学校、教师直接干预学生;二是学校教育手段灵活多样,各类课程、电子模拟演练、角色扮演等方式都需要借助学校课程或者活动来实现,没有学校的参与,法律的落实和项目的推进都将失去依托。

#### (四) 设计系列实操课程,反欺凌教育推进合理

北欧三国反欺凌课程有两个特点:一是课程安排系列化,按照学生年级、课程难度进行编排设计,具有系统性。二是时间安排合理,不干扰学校正常的教学进度。以KiVa和OBPP为例。KiVa课程设计涵盖的方向符合芬兰国家核心课程的主题,因此,教师和校长将实施KiVa作为本职工作的有效工具,而没有将其作为实际课程之外的额外负担。KiVa的普遍干预措施包括三种适合不同年龄的版本,分别是1—3年级、4—6年级和7—9年级。在1—3年级和4—6年级,教师一个学年中为学生提供10堂课(每堂课90分钟)。到了7—9年级,学生则需要学习4个主题,这些主题可以作为系列课程,需要13—23节课。OBPP则利用每周的班会课(20—40分钟)和家长会时间进行。这些课时量分布在一个学年中比较容易安排,授课的时间点与学校的相关课程相一致。这样的课程设计与安排,既保障了课程影响的深入、全面,又保障了课程的顺利开展,充分保障了课程干预的效果。

#### (五) 开发项目内容丰富,辐射校家社多主体

单一的项目内容很容易让教师和学生失去兴趣,而北欧三国的反欺凌项目以其多样化的手段、多元化的参与形式让教师、家长、学生沉浸其中。以KiVa为例,一是给学生、教师和父母提供具体材料,

如为教师提供干预方案、个人与社会教育课程、设备和培训,为家长提供反欺凌的信息和建议(家长指南),为学生提供反欺凌的班级课程<sup>[37]</sup>;二是通过一个虚拟学习环境,如反欺凌网络游戏、反欺凌论坛来提高学生与同龄人的交往技能,强化反欺凌学习;三是通过小组谈话、课程练习增强学生的同理心、自我效能感并提升学生对受害同伴的支持。

KiVa既包括普遍干预行动,如学生课程(小学阶段)和主题(中学阶段)、虚拟学习环境(针对小学生的反欺凌电脑游戏,针对中学生的互联网论坛),又包括特定的干预措施,如与受欺凌者和欺凌者进行讨论,并与那些挑选出来的、敢于支持受害同学的学生进行讨论。

#### 四、我国反校园欺凌的努力方向

近几年,我国在校园欺凌治理的法治化建设方面发展迅速。2015年以来,我国先后出台了近10部法律法规来治理校园欺凌。各省市也先后出台了70多项与反欺凌相关的意见、通知。这些法律规章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警示学生行为的作用,但也有其局限性。一是欺凌更多地发生在中小學生中,就年龄和行为的恶劣程度来看,对绝大多数欺凌行为很难纳入法律的惩治范围。二是欺凌行为大都比较隐蔽或者发生在比较隐蔽的场所,欺凌者很难拿出确凿的证据。近几年,网上曝出的几起情节恶劣的欺凌事件,大都是旁观者拍下了视频发到网上受到关注,当事人才得到惩治,更多的欺凌案件并没有被曝出来。因此,法律规章的出台仅仅是干预校园欺凌的第一步。我国反校园欺凌工作还需从以下四个方面努力。

一是完善制度,保障反欺凌走深走实。首先,进一步完善追责制度。目前教育部出台的反欺凌的指导意见中,更多关注对欺凌学生的惩治要求,对学校、教师作为学生安全责任的监管方则缺乏相应的追责制度,因此,防治校园欺凌也难以引起学校、教师的高度重视。其次,进一步完善欺凌处置的基本流程。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对欺凌进行分类并启动不同的应急处置流程,确保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教师规范合理地处理这些事件。再次,进一步完善部门协作制度。对于造成学生身心伤害的欺凌事件,公检法什么时机介入、如何介入,这些需要细化,确保部门协同到位。

二是系统布局,构建反欺凌合作网络。根据笔者的观察,当前基础教育防治校园欺凌采取的措施大都比较零散,有的利用周一升旗的时候发布反

欺凌宣言,有的通过主题班会、专家讲座进行宣传,有的通过张贴欺凌举报电话进行监督。这些做法有一定作用,但治标不治本。反校园欺凌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有系统思维,具备健全的领导队伍、完善的制度、合理的处置流程、科学的心理干预、广泛的参与者、多样化的课程和一定的课时保障等要素,形成一个反欺凌的有效体系,共同发力。

三是研发项目,确保学校有项目可用。当前我国反欺凌面临的比较大的挑战是缺乏科学有效的反欺凌项目。比较理想的做法是以重大招标课题的方式,鼓励高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组建团队研发反欺凌项目。对国内已经成型的反欺凌项目鼓励其在区域内进行试点,并予以资金支持,通过循证研究,确保项目的科学性。项目研发要多条腿走路,便于一线学校根据学校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对那些相对成熟的项目,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在全国选择试验区进行逐步推广。力争在未来3—5年内,能够打造几个比较成熟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反校园欺凌干预项目,更好地为一线学校服务。

四是加强培训,提升教师反欺凌的效能感。教师群体是学校反欺凌的重要力量。部分教师或者对欺凌存在误解,或者对自身干预欺凌的能力不够自信。针对这些情况,首先,对新教师进行职前培训时,就要将遏制和处理校园欺凌这项内容纳入新教师的必修课,提升教师反校园欺凌的知识和技能储备。其次,当学校发生欺凌事件时,学校领导牵头,带领教师进行妥善处理,事后对整个处理过程进行复盘并形成典型案例,供全体教师学习。三是鼓励一线教师将反欺凌教育与思政课、心理健康课、班会课、团队课等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课程的育人功能。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EB/OL]. (2014-09-10) [2025-05-30]. [https://www.gov.cn/xinwen/2014-09/10/content\\_2747765.htm](https://www.gov.cn/xinwen/2014-09/10/content_2747765.htm).
- [2] KOYANAGI A, OH H, CARVALHO A F, et al.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suicide attempt among adolescents aged 12–15 years from 48 countries[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2019, 58(9): 907–918.
- [3] ZWIERZYNSKA K, WOLKE D, LEREYA T S. Peer victimization in childhood and internalizing problems in adolescence: A prospective longitudinal study[J].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2013, 41(2): 309–323.
- [4] JIMERSON S R, SWEARER S M, ESPELAGE D. The handbook of school bullying: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M].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377–401.
- [5] KIVA I. Evidence of effectiveness in Finland and elsewhere[EB/OL]. (2024-05-28) [2025-05-30]. <http://www.kivaprogram.net/is-kivaeffective>.
- [6] DUE P, HOLSTEIN B, LYNCH J, et al. Bullying and symptoms among school-aged childre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cross sectional study in 28 countries[J]. *Europe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05(15): 128–132.
- [7] HARDY I, RÖNNERMAN K, BEACH D. Teachers' work in complex times: The 'fast policy' of Swedish school reform[J].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2019, 45(3): 350–366.
- [8] SWEDISH NATIONAL AGENCY FOR EDUCATION. Utvärdering av metoder mot mobbning[M]. Stockholm: Fritzes, 2011: 41.
- [9] LARSSON P. Bullying prevention in a Swedish municipality: Supported decentralised reasoning[J]. *Forskning og Forandring*, 2018, 1(2): 69–90.
- [10] CURRIE C, ROBERTS C, MORGAN A, et al. Young people's health in context Health Behaviour in School-Aged Children (HBSC) study: International report from the 2001/2002 survey[R].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4.
- [11] COMMITTEE FOR SCHOOL WELFARE.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school welfare[R]. Ministry of Education Committee Reports, 2005: 27.
- [12] HELMINEN J. Preventing bullying, offline and online[EB/OL]. (2021-08-30) [2025-04-01]. <https://www.goodnewsfinland.com/articles/five-from-finland/2021/preventing-bullying-offline-and-online/>.
- [13] Evaluation of anti-bullying methods in Finland[EB/OL]. (2023-06-05) [2025-04-02]. <https://www.kivaprogram.net/experts-corner/evaluation-of-anti-bullying-methods-in-finland/>.
- [14] OLWEUS D, ROLAND E. Mobbing: Bakgrunn og tiltak[R]. Oslo: Kirke-og Undervisningsdepartementet, 1983.
- [15] ROLAND E. Bullying in school: Three national innovations in Norwegian schools in 15 years[J]. *Aggressive Behavior*, 2000, 26(1): 135–143.
- [16] ROLAND E. Mobbingens psykologi[R]. Oslo: Universitetsforlaget, 2007.
- [17] TIKKANEN T, JUNGE A. Realisering av en visjon om et mobbefritt oppvekstmiljø for barn og unge[R]. Stavanger: Rogalandsforskning, 2004.
- [18] WENDELBOG C, MELINA R T B. Læring-smiljøprosjektet sluttrapport for evalueringen av læring-smiljøprosjektet[R]. Trondheim: NTNU Social Research, 2018.
- [19] STØEN J, GUTZWILLER-HELFFENFINGER E. Addressing school bullying on the level of educational legislation: The example of Norway[J]. *Bildung und Erziehung*, 2023, 76(3): 265–274.
- [20] SVENSK F. Lagen om förbud mot diskriminering och annan kränkande behandling av barn och elever[M], Stockholm:

- Fritzes förlag, 2006:67.
- [21] 陶建国. 瑞典校园欺凌立法及其启示[J]. 江苏教育研究, 2015(34):3-6.
- [22] Evaluering av nytt kapittel 9A i opplæringsloven[EB/OL]. (2019-08-14) [2025-03-12]. <https://www.udir.no/globalassets/filer/tall-ogforskning/rapporter/2019/evaluering-av-kap.-9a-i-opplaringsloven-2019.pdf>.
- [23] 周菲菲, 郭志英. 芬兰校园反欺凌 KiVa 项目的发展、组织与实施[J]. 比较教育研究, 2017, 39(10):40-45.
- [24] 郑彩华. 国际视野中的学校暴力欺凌及其预防和应对[J]. 现代教育论丛, 2017(5):2-8.
- [25] 李锋, 史东芳. 挪威反校园欺凌“零容忍方案”研究述评[J]. 教育导刊, 2015(2):91-95.
- [26] PÖYHÖNEN V, JUVONEN J, SALMIVALLI C. What does it take to defend the victimized peer? The interplay between personal and social factors [J].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2010, 56(2):143-163.
- [27] FLYGARE E, GILL P E, JOHANSSON B. Lessons from a concurrent evaluation of eight antibullying programs used in Sweden [J]. American Journal of Evaluation. 2013, 34(2):170-189.
- [28] SALMIVALLI C, KÄRNÄ A, POSKIPARTA E. Counteracting bullying in Finland: The KiVa program and its effects on different forms of being bullied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011, 35(5):405-411.
- [29] 杨婕, 马焕灵. 挪威校园欺凌防范机制研究——以奥维斯欺凌防范项目为例 [J]. 现代教育管理, 2017(12):119-123.
- [30] 陶建国, 王冰. 挪威中小学校园欺凌预防项目研究 [J]. 比较教育研究, 2016, 38(11):9-14.
- [31] KÄRNÄ A, VOETEN M, LITTLE T D, et al. Effectiveness of the KiVa antibullying program; Grades 1-3 and 7-9: Correction [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13, 105(2):551-551.
- [32] MYNDIGHETEN FÖR SKOLUTVECKLING. Granskningar av utvärdering av program mot mobbning 2007 [R]. Stockholm: Myndigheten förskolutveckling, 2007.
- [33] WENDELBORG C. Bullying and quiet at work analysis of the student survey for the academic year 2018/2019 [R]. Trondheim: NTNU Social Research, 2019.
- [34] KÄRNÄ A, VOETEN M, LITTLE T, et al. A large-scale evaluation of the KiVa antibullying program; Grades 4-6 [J]. Child Development, 2011, 82(1):311-330.
- [35] LINDGREN J, CARLBAUM S, HULT A, et al. Skolans arbete mot kränkningar: Juridifieringens konsekvenser [M]. Malmö: Gleerups, 2020:39-71.
- [36] BARN- OCH ELEVOMBUDET. En skola fri från mobbning och kränkningar [EB/OL]. (2010-08-01) [2025-03-20]. <https://www.skolinspektionen.se/globalassets/02-beslutsrapporter-stat/broschyreer/beo-folder-skolpersonal.pdf>. 2016.
- [37] 王永春, 刘怡. 芬兰基础教育反欺凌项目: 理论、实施路径及反思 [J]. 教育探索, 2017(6):107-111.
- [责任编辑 金钊]

## Major Anti-School-Bullying Measures in Sweden, Norway, and Finland and Their Experience Sharing for China

LI Jianwei<sup>1,2</sup>, LIU Sishuo<sup>3,4</sup>

(1.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China;

2. Institute of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3. Jing Hengyi School of Educatio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1121, China;

4. Qingdao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 Qingdao, Shandong 266012, China)

**Abstract:**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school bullying incidents has made bullying prevention a global educational challenge. Sweden, Norway, and Finland in Northern Europe have pioneered comprehensive and effective systems for addressing school bullying, featuring early intervention and well-established frameworks. These three countries have enacted legislation, with governments leading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to develop anti-bullying programs. By implementing diverse anti-bullying curricula and activities, they have steadily advanced anti-bullying initiatives,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ir efforts.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placed significant emphasis on combating school bullying. Accordingly, by drawing on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of these Nordic countries while learning from their shortcomings, China can tailor strategies to its national context. In this vein, future efforts should focus on constructing a robust anti-bullying system, adhering to scientific research paradigms, and priorit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targeted anti-bullying programs to ensure tangible progress in addressing school bullying in China.

**Key Words:** the three Nordic countries; school bullying; system construction; intervention; evaluation